

陈驰蕊, 何峰, 汤放华. 2022. 情感地理视角下脱贫村农户情感重构——以湖南省十八洞村为例. 热带地理, 42 (4): 579-591.

Chen Chirui, He Feng and Tang Fanghua. 2022. Emotional Reconstruction of Farmers in Poverty-Alleviated Villa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otional Geography: A Case Study of Shibadong Village in Hunan Province. *Tropical Geography*, 42 (4): 579-591.

情感地理视角下脱贫村农户情感重构 ——以湖南省十八洞村为例

陈驰蕊^{1,2}, 何峰^{1,2}, 汤放华^{1,3,4}

(1. 湖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长沙 410082; 2. 地理空间大数据挖掘与应用湖南省重点实验室, 长沙 410082;
3. 湖南城市学院, 湖南 益阳 413000; 4. 数字化城乡空间规划关键技术湖南省重点实验室, 湖南 益阳 413000)

摘要:以湖南省花垣县十八洞村为案例地,以“留守”农户和“返乡”农户为研究对象,基于情感地理视角,通过深度访谈法和参与式观察法探究了精准扶贫政策影响下农户情感重构及其重构机制。结果表明:1)脱贫村农户情感重构主要包括归属感、幸福感、风险厌恶感、相对剥夺感和失落感5个维度的重构,这些维度相互影响、相互制约。2)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使得脱贫村农户地方归属感上升,幸福感增强,风险厌恶感下降。然而,扶贫力度的不均衡导致农户间的相对剥夺感增强,传统文化的消解和社会关系的重构等使得农户产生失落感。3)在脱贫村农户情感重构过程中,农户认知是核心力量,政府行动起主导作用,企业行动发挥辅助作用。政府和企业行动通过重构乡村地域系统的物质空间、经济空间和社会空间刺激乡村地域主体即农户认知转变,继而引发情感的重构。

关键词:情感地理;情感重构;农户;脱贫村;精准扶贫政策;十八洞村

中图分类号: K90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5221(2022)04-0579-13

DOI: 10.13284/j.cnki.rddl.003459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紧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首次并列提出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2020年11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关于改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绩考核的通知》中要求把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评判领导干部推动高质量发展政绩的重要标准。党对民生“三感”的重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且在制定民生政策时,其关注点已由物质、精神层面上升到情感、心理层面。因而从农户的情感层面分析脱贫攻坚政策的实施效果,是响应国家重视民生“三感”的号召。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国农业与农村现代化和农民生活富裕的两项重大战略任务,而产业

兴旺是衔接两项政策的关键环节(汪三贵等,2020),人才兴旺是产业兴旺的支点。农村发展的人才“缺位”问题,需要“返乡”人口来解决(林亦平等,2018)。如何留住人才,激发农户内生动力,实现人才兴旺是脱贫村实现振兴首要解决的问题。精准扶贫工作在完善基础设施、优化产业结构和升级乡村服务水平等方面成绩斐然(汪三贵等,2020),在物质层面为脱贫村“返乡”农户回乡架桥铺路。“返乡”农户回乡,不仅需要脱贫村营造良好的物质环境,还需要情感关怀。情感关怀有利于个体作出正确的行为选择(杨宝泉等,2008),可帮助“返乡”农户消解归乡疑虑,更快更好地适应重构后的乡村环境。同样,对于一直留守乡村的

收稿日期: 2021-08-11; 修回日期: 2021-12-05

基金项目: 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重点项目(20A318);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9YBA227)

作者简介: 陈驰蕊(1994—),女,江苏宿迁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文化和自然遗产研究与旅游规划,(E-mail) 1032766975@qq.com;

通信作者: 何峰(1975—),女,湖南岳阳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乡村聚落地理、历史文化资源保护等,(E-mail) hefeng@hunnu.edu.cn.

农户,也需要从情感层面给予引导,将其“消极情感”转为“积极情感”,激发内生动力。

“情感转向”是人文地理学继“文化转向”后的又一次强有力的哲学思潮,人文关怀和情感关怀在地理学中将能得到更充分的体现(朱竑等,2015)。2002年9月,第一届情感地理学国际研讨会成功召开。随后,《情感地理》论文集的出版和情感地理专刊*Emotion, Space and Society*的创建,引发不同学科领域学者对情感地理学研究的重视。情感地理学者关注人在社会情境中情感的建构机制及其与空间场所的相互作用,从而使地理研究突破唯科学主义的研究方法,实现“情感转向”。目前,国内有关情感地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地游客的情感体验(赵昭等,2018;孙小龙等,2019)和评价(刘逸等,2017)、流动人口或家庭的情感感知(邹雪瓶等,2020)和情感重构(陶伟等,2019)、城市居民情感与地方环境的关系(王孟永,2018;行腾辉等,2021)、乡村地域居民情感依恋(吕龙等,2021)及其与乡村治理的关系(林元城等,2020)等方面,对乡村地域系统重构中农户情感变化的研究较为薄弱。外在环境对个体内心的刺激是情感产生的必要因素,因此地理环境和空间场所是情感发生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吴丽敏,2020)。情感作为个体生活的中心,能够敏感地感知到周围物质空间和社会环境的演变,故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William, 2001)。事实上,中国的精准扶贫政策蕴含着情感维度,但已有研究过度强调技术理性而忽视了对于情感性因素的探讨(程军,2019)。农户是农村中集生产、消费和血缘于一体的基本社会单元,其行为逻辑不仅具有经济理性,还具有社会理性(赵明,2020)。农户在决策时,常常会为了家庭团聚、子女教育、赡养父母而牺牲一定的经济收入。在经济积累到达一定程度后,农户的需求会转向精神性价值需求,如竞选村长,获得名誉和声望。农户情感需求层次的演替是农户行为逻辑变化的内在根源。因此,情感研究在人地关系中恰恰是最应该关注的领域。不了解人地关系重构中农户的情感诉求,就无法准确理解农户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更无法保证脱贫村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顺利接轨乡村振兴战略。

目前,针对脱贫村情感维度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制度层面,如从“情感治理”(程军,2019;向德

平等,2020)、“精神扶贫”(程肇基,2016;房彬等,2021;曹艳春等,2018;)等角度探讨扶贫工作者如何将情感融入政策实践,使乡村治理更加有温度。也有涉及脱贫农户情感历程的研究,如左昭(2018)、陈淇淇(2019)、丁波(2020)等探究了易地扶贫搬迁户在迁往城镇安置区后,生活空间、社会属性突然转变后的情感不适应性。这些成果集中探讨如何自上而下消减脱贫农户的消极情感,却没有将农户这一微观主体的情感变化在宏观政策的语境中完整地展现出来。因此,本文从农户微观视角出发,采用质性研究的方法,探讨精准扶贫政策引发的乡村地域系统变化对脱贫村农户情感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投射到行为上的表现,并由此探究脱贫村农户情感重构机制,以期为促进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有益参考。

1 情感地理视角

1.1 情感的特征

情感地理理论认为,情感具有空间性、时间性、社会性和层次性4个特性。“民族心理、情感的形成往往与地区内的自然环境、文化环境相关”(邵培仁等,2011),体现情感的空间性。在不受任何外界的干预下,人们对某一地方的情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衰弱、模糊甚至消亡。依照时间性的特点,情感可划分为即刻性、短暂性和永久性。情感的社会性体现在情感同化,指个体情感可以影响他人的情感和思维,也容易受社会潮流感染。层次性指经过长期的社会互动和人际交往,初级情感会转化为高级情感,高级情感可以调节、支配初级情感,且更加稳定,不易随时间而改变。

贫困村主要分布在深石山区、高寒区、生态脆弱区、灾害频发区和生态保护区(刘彦随等,2016)。偏僻的地理位置、恶劣的自然条件、少量的就业机会使当地农户承受着巨大的生存压力,他们对贫困有着深深的畏惧感,对未来产生消极、迷茫的情感,这体现情感的空间性。长久的贫困状态导致农户对贫穷形成刻板印象,变得无助、麻木从而丧失脱贫动力,降低自我效能,影响心理健康(Micklson et al., 2008),这种情感和态度经过时间沉淀成为永久性情感,体现脱贫村农户情感的时间性。贫困群体人际关系狭窄,惧怕对外的社会交往,形成内部交往的“小圈子”,从而加重其与社

会脱节程度，同时这种固化的“小圈子”内部的消极情感也会通过传染和强化，形成规模效应，体现脱贫村农户情感的社会性。一旦农户对贫困产生恐惧感和无助感，没有外界的干预，这种情感会随着时间的固化，并经过代际传递成为高级情感，长期支配农户的行为，体现农户情感的层次性。精准扶贫政策影响下的脱贫村农户情感充分体现情感地理理论提出的情感具有空间性、时间性、社会性和层次性4种特性。

1.2 情感的维度构成

重构指对当前出现矛盾而无法正常运行的系统进行重新建构进而实现系统良性运转的过程（Kiss, 2000）。Woods（2011）将乡村重构定义为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农村地区社会经济结构的重新塑造。本文的情感重构特指精准扶贫语境下的脱贫村农户情感的重新塑造。为了能准确解析脱贫村农户的情感，首先需要确定农户情感的研究维度。吴良镛先生认为，村落也是社区（吴良镛，2001），而Macclver（1931）认为社区自身意识、位置和身份感、依属感是社区居民情感的3个维度；邓遂（2003）则认为，社区情感只包括积极情感，即有利于人们和谐关系的情感总称，如社区归属感、认同感、亲密感、依恋感等，其中社区归属感是核心情感。鉴于研究对象为脱贫村农户这类特殊群体，将从归属感、幸福感、风险厌恶感、相对剥夺感和失落感等5个维度来分析其情感重构。情感虽捉摸不透但也有迹可循，人们的行为与决策是思想、情感作用的结果（Nancy, 2004），因此，将农户行为和决策视为个体情感表征，据此探究农户对地方的情感重构。

2 案例地及研究设计

2.1 案例地概况

十八洞村隶属湖南省湘西州花垣县双龙镇，是一个典型的苗族聚居行政村。2005年7月因区划地名调整，十八洞村由原来的竹子村、飞虫村2个村子合并而成。其中，飞虫村包括飞虫寨和当戎寨，位于村北端；竹子村包括竹子寨和梨子寨，位于村南端，两村相隔约4 km（图1）。连绵的群山造就十八洞村优美的自然环境和丰富旅游资源，也造成人均耕地仅0.06 hm²的恶劣生活条件。2013年以前，虽然国家政策一直在支持，但仍存在“年年扶贫年



图1 竹子村和飞虫村分布

Fig.1 Distribution of the Zhuzi and Feichong Village

年贫”现象。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十八洞村视察，首倡“精准扶贫”理念，十八洞村的发展才出现转机。通过几年的扶贫建设，十八洞村不仅脱贫成效显著，还探索出可复制可推广的扶贫经验，成为全国脱贫攻坚样板村，昔日贫穷落后的偏远苗寨蜕变成中国脱贫攻坚历程中的地标。因此，选择十八洞村作为案例地分析精准扶贫战略影响下农户情感与地方、情感与行为之间的关系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

2.2 研究设计

2020年之前，精准扶贫政策使得多方力量参与贫困村的建设，贫困村人地关系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在外界力量干预期间，农户生活的物质空间、社会关系、价值观念和人力资本等都发生了改变，从而引发农户地方情感的重构。目前，脱贫村中存在3类农户，第一类是“留守”农户，即一直生活在村子里，没有离开过村子的农户；第二类是“返乡”农户，即从务工的城市回到脱贫村的农户；第三类是外城农户，即仍然在城市务工，但是与脱贫村保持稳定联系的农户。由于“留守”农户和“返乡”农户参与脱贫村的生产、生活和治理决策，其情感重构能有力说明十八洞村从贫困村到脱贫村其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发展变化对农户地方情感的重塑。此外，个人情感与集体情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麻三山, 2009), 情感的社会性又要求在研究过程中重视集体情感对个人情感的约束和管理, 因此, 本研究对象界定为“留守”农户和“返乡”农户的个体情感和集体情感。

情感地理需充分汲取女权主义、现象学、精神分析法和非表征理论等多元的理论方法(朱竑等, 2015), 而定量研究方法用“科学”“客观”“中立”“自上而下”地展现社会的方法, 其验证假说的过程较为“标准化”(陶伟等, 2019), 难以呈现农户这一基本社会单元动态的情感感受, 因此基于质性研究方法, 通过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 对研究现象进行深入的整体性探究, 从而了解农户在生产生活方式、社会关系和文化心理等方面的现状与变化, 并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

于2021-01-12—15、09-23—26对案例地及其农户进行调研和参与式观察。1) 从线上线下查阅、收集资料, 初步了解案例地在扶贫前、中、后时期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人居环境、产业结构、人口结构等的大致变化情况, 确定调研的样本结构和访谈重点。2) 通过参与式观察, 了解农户的基本情况、生活轨迹和行为逻辑。3) 联系农户, 说明调研的目的, 结合实际情况, 在每户中抽选1~2个访谈对象, 对每个访谈对象进行15~50 min的深入访谈, 在征得对方同意的情况下对访谈过程进行录音。4) 访谈内容以农户及其家庭成员基本信息、农户在城乡间的流动经历为切入口, 采用半结构式的深度访谈, 让被访者叙述真实的生活经历和体验, 将口头表述与生活实践有效结合, 形成对社会事实具有说服力的厚重描述。5) 初步整理笔记, 对存疑的地方, 进一步追问被访者; 对农户多次提及的历史事件, 重点追述。6) 向被访谈者致谢。7) 将录音资料逐字逐句誊写。8) 筛选样本, 保留具有代表性的访谈记录。9) 针对遗漏或需完善的调研内容进行补充调研, 调研过程与首次调研基本相同。访谈地点在小卖部、广场、村口和农户家中, 访谈时常常有几户人聚集, 并且参与了访谈。访谈者及其基本信息详见表1所示。

3 脱贫村农户的情感重构

3.1 归属感上升

地方归属感指居民对所在地方社区和所属群体

表1 访谈者及其基本信息

Table 1 Interviewers and their basic information

序号	职业	性别	年龄	农户类型	村寨
1	餐馆经营者	男	25	“返乡”	飞虫
2	售票员	女	27	“返乡”	飞虫
3	务农	男	39	“返乡”	飞虫
4	待业	男	40	“返乡”	飞虫
5	景区讲解员	女	40	“返乡”	飞虫
6	务农	女	41	“返乡”	飞虫
7	务农、打零工	男	45	“返乡”	飞虫
8	务农	男	47	“留守”	飞虫
9	民宿经营者	男	50	“返乡”	飞虫
10	务农、打零工	男	50	“返乡”	飞虫
11	零售经营者、务农	女	58	“留守”	飞虫
12	务农、打零工	男	59	“返乡”	飞虫
13	苗绣合作社经营者、务农	女	68	“留守”	飞虫
14	民宿经营者	男	73	“留守”	飞虫
15	务农	男	75	“留守”	飞虫
16	待业	女	30	“返乡”	当戎
17	打零工	男	40	“返乡”	当戎
18	保安	女	48	“返乡”	当戎
19	讲解员	女	33	“返乡”	竹子
20	讲解员	女	37	“返乡”	竹子
21	务农、打零工	男	45	“返乡”	竹子
22	民宿经营者	男	50	“返乡”	竹子
23	护林员	男	55	“留守”	竹子
24	务农	男	69	“留守”	竹子
25	务农	男	75	“留守”	竹子
26	务农	男	83	“留守”	竹子
27	讲解员	女	26	“返乡”	梨子
28	民宿经营者	女	40	“留守”	梨子
29	教师	女	46	“返乡”	梨子
30	民宿经营者	女	55	“留守”	梨子
31	务农	男	55	“返乡”	梨子
32	民宿经营者	女	68	“留守”	梨子
33	零售经营者	男	72	“留守”	梨子

注: 访谈对象均为户主或是在决策中有重要影响的家庭成员。

的认同、喜爱和依恋(杜宗斌等, 2013)。地方归属感分为地方认同和自我认同2个阶段, 地方认同是自我认同的基础。其中, 地方认同是功能依赖, 自我认同指在地方建立社会关系, 参与地方活动, 为地方做贡献的倾向程度(古丽扎克伯等, 2011)。个体对所在社区和所属群体的认同感越强, 将这种情感转变成实践行为的几率越大, 相应地, 会越发关注社区的发展与建设(丁凤琴, 2010)。

脱贫攻坚时期, 食品充足、人身安全等是农户的首要需求; 后脱贫攻坚阶段, 教育、娱乐、发展前景等成为农户的功能性需求。如果地方顺应社会

发展,及时提供满足农户需求的条件,人与地方的联系将更加紧密。如果地方囿于困境无法承载这些功能,无法满足农户对美好生活的需求,那么人与地方的情感会由紧密变为疏远甚至断裂,表现在现实中就是人的迁徙和村落的衰败。2013年前,十八洞村以第一产业为主,农户入不敷出,生存艰难,产生逃离感,村中2/5的劳动力人口选择外出打工。脱贫攻坚阶段,通过各项扶贫措施,十八洞村实现乡村地域系统的重构,满足了农户的基本生存和发展需求,吸引许多在外务工的农户返乡。至2020年底,在外务工的十八洞村农户中有一半选择返乡,此时农户对地方是功能性依赖,处于地方认同阶段。十八洞村农户积极参加合作社,支持村集体经济发展;组建志愿者队伍参与村中建设;在修建基础设施时,响应号召改造庭院、出让土地、支持村中拓宽道路;为实现脱贫目标,农户穿起苗服,营造苗族文化氛围,积极推动乡村旅游业发展;当有个别农户阻挠发展进程时,农户们自发用传统的方式积极维护村集体的共同利益。农户与十八洞村的联系由单方面的功能依赖转为双向互动,农户情感由地方认同上升至自我身份认同,归属感上升。

“在外面会想念家乡……想念家乡农闲时,休息的时候,去山上找野果吃,那个时候有很多乐趣。我也不愿意搬到城里去,不向往城里的生活……我喜欢自己的村子,自己家的感觉。我喜欢宽敞,我不喜欢在城里挤来挤去的。”——访谈对象1

“2014年,村里要修路,需要的石板要从山上搬下来,于是村里青年们组成青年突击队去帮忙搞建设,义务工作,不要一分钱,全是村里的人,每家都出劳动力,干了3年,一分钱没要。”“之前(驻村)工作队修路,要从(一户)村民的田地里经过,他家不让……我们一个寨子的人就劝他,然后那户人家就同意了。”——访谈对象5

“关心村中的建设呢,他们要扩宽那个马路,把我家这个房子都拆掉了,他们就重新(盖成这种房子)。村里面的建设也支持,用到我们地盘哪里,(要)让出来的,哪能不让,村里面要开发啦。”

——访谈对象11

“一直在外面打工八年了,2017年的时候才返乡的。因为家里就有就业岗位提供,可以就近就业,然后就可以照顾到家里的老人孩子……在外地打工

肯定会想家啊,非常想啊,背井离乡嘛,照顾不了家里面,有的时候有四个春节是没有回家过年的,那家乡的乡愁对于在外的人来说都是有一种牵挂,然后家里面的老人孩子感冒啊,不舒服啊,太远了,你也(照顾不到)。”——访谈对象22

3.2 幸福感增强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让广大农民在乡村振兴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2019)。幸福感是指居民对其生活质量做出的认知和情感的总体性评价。生活质量、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是衡量人民生活幸福的重要指标(Moeinaddini et al., 2020)。经济收入方面,2013年十八洞村人均收入1 668元,收入来源以“务农+打工”为主。精准扶贫政策实施后,由于村内产业结构优化、各种经济体繁荣发展,农户收入结构转变为“务农+零售业+打零工+合作社分红”,收入来源多样化。至2020年,人均收入达到18 369元,较2013年涨幅明显。

十八洞村地处偏远深山,精准扶贫政策实施前,封闭、落后,农户日常生活用品的采买、农产品的销售等均需要前往排碧乡或麻栗场镇。由于交通不便,农户出行都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成本和精力,因此解决交通问题是十八洞村农户最大的心愿,对交通通达性的渴望影响着一代代的十八洞村人。

“没扶贫之前,中国烟草来村子里让每家每户种烟叶,烟草公司就给村里修一条路(机耕道),当时所有人都回来种烟草,外面打工的人都回来种(烟叶)了,就是为了那条路(机耕道),让大家方便。以前我们种稻子都是从那边搬过来,都是走的小路,那很远很远的。”——访谈对象1

“以前交通非常落后,村民出行全靠两条腿,经常要走2、3个小时的山路才能与外界取得联系……那个时候山路很窄,只能用肩膀(扛)、挑、背……现在从村里到花垣县和吉首市差不多远了,吉首市虽说(距离村子)有38 km,但现在不一样了,有了这个高速,路程基本上都是40 min就能到的。”——访谈对象5

扶贫政策实施后,政府拓宽村道4.8 km,打通了进村公路,并开设了村寨间的直通车、城乡干道车等交通线路,彻底改变了十八洞村农户的出行方

式和范围,有效提高了十八洞村寨的可达性,方便农户与外界的沟通交流。基础设施的完善和经济收入的增加,提高了农户的生活质量,削弱农户的愁苦、无奈等情感。农户们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洞村首倡精准扶贫政策,给十八洞村带来了新希望和好生活,如今十八洞村勤劳致富的形象,独特的民俗文化和红色教育意义让农户倍感自豪,让生活在十八洞村的农户幸福感与日俱增。

“就是非常自豪,你看以前村里的人就比较自卑啊,人家说嫁人啊,千万不要嫁到这里来。特别是这里的男青年,出去的话不敢说是从这里出去的。现在我说是吉首(市)啊,花垣(县)啊,很多人都不知道,那我说是十八洞村,很多人都知道了。”

——访谈对象22

“以前路没通的时候,肥料要到排碧去挑回来。那个最让人恼火啦……因为没有路,走的都是弯弯曲曲的小路哇……现在条件好了,现在我们村子上光小车(汽车),就有几十部了,我家里就有2部……”

——访谈对象33

3.3 风险厌恶感下降

风险厌恶来源于经济学,指投资者对方案风险的态度。引用该概念表达农户对贫困和经济决策的态度。虽然现行脱贫标准下贫困人口已经实现脱贫,但多数农户的生活仍处于生存线的边缘,基于思维惯性和对贫困的畏惧,他们的行为是不冒险的,会考虑尽量减小最大损失概率(罗婷,2020)。风险厌恶是这些农户的生存需要,是基于“灾难避免”的理性考虑(蒋莉莉,2012)。这种观念阻碍着脱贫村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

十八洞村山高地陡,耕地零落,难以发展规模农业。2014年,驻村工作队和村支两委采取“飞地模式”发展集体经济,在临村流转土地种植优质猕猴桃,成立十八洞村苗汉子果业有限责任公司,倡导村民以产业扶贫资金入股,日后参与集体经济收益分红。但是农户们认为资金跟着干部,如果干部走了,投资就“黄”了。后来由于有党员的带头加入,农户才将信将疑地投资入股。

贫困农户因为缺乏认知资源和投资的能力,经常会作出低质量的经济决策(杭承政等,2017),他们更多地关注眼前利益,投资行为主要跟随集体决策而非自发意识。扶贫工作队用“以身试险”和

“以身作则”的方法,消解了农户心中的不安;并用工作成果稳定农户对投资收益的信心。村委考虑全局,给当初没有加入合作社的农户也分发利润,共享集体经济收益的果实,激励农户的投资行为。投资行为是农户的理财意识初步觉醒,也反映其脱离“挣扎在生存线边缘”后的心理状态。如果没有政府和党员行动的引领,农户很难在短时间内接受这种投资行为。

“一开始本应该是从村民家开始,但是村民不同意,就先从党员开刀。有时村民会想,别人给十八洞村投资了多少多少钱,但是村民们没有立刻看到,就会说一些难听的话。像猕猴桃产业,等人家(驻村工作队)走后,猕猴桃(合作社)分红了,村民才意识到,人家(驻村工作队的做法)可能是对的。”

——访谈对象5

“其实我们年轻人都好说话,就是老人家会认为,土地给了人家,就是人家的了,拿不回来了……可是你看,土地种了那么多年,不还是那个样子,也不能赚好多钱,还不如给上面,让上面的人去搞。”

——访谈对象16

“之前进猕猴桃合作社,要每人拿出100元的租减费,飞虫寨那边的人没交,后面也分钱给他们了,就是分的少,现在他们也后悔了。”

——访谈对象33

3.4 相对剥夺感产生

当个人将其处境与参照群体中的人相比较,发现自己获取的权益处于相对劣势后产生的情感即为相对剥夺感。它是一种消极情感,反映人们对现实的不满情绪,一旦这种情感转化为行为动力,就可能对社会秩序产生强大的破坏(李平等,2013)。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指与参照群体对比的同期经济收入)的差异会影响农民的相对剥夺感。

十八洞村由飞虫村和竹子村合并而成,受地理区位和资源禀赋差异的影响,两村多年来存在人心不齐的现象。飞虫村因为靠近国道G209,较早修通连接国道的公路,当时的村部也建在飞虫村,对于飞虫村的农户来说,其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一直高于竹子村。2013年,因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的是十八洞村更深处的竹子村,因此,竹子村成为十八洞村的核心景区,精准扶贫广场、精准扶贫展览馆、游客接待中心、高端民宿和精品旅游线路等都分布在

竹子村中，村部也从飞虫村迁往竹子村。不仅如此，竹子村维持着整洁统一的村容村貌，尤其是梨子寨的民居群、巷道、基础设施和周边环境等都进行风貌的整治，人居环境得到大力改善。但飞虫村风貌相对较为杂乱，传统民居中混杂突兀的现代建筑，村貌整治和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大不如竹子村。由于许多政策福利和产业红利向竹子村倾斜，飞虫村农户的相对剥夺感较为强烈，产生怨恨情绪，不利于整个村子的和谐稳定发展。

“那肯定梨子（寨）开发得好啊，开发也就开发那边（梨子寨去，这里（飞虫村）没什么的。有时候旅客们问我们说这里（飞虫村）是哪，我们就说，到那边（梨子寨）去，我们这里（飞虫村）不是十八洞，我们是十九洞。”——访谈对象8

“他们那边（竹子村）一个样，我们这边（飞虫村）一个样，这边（飞虫村）都没怎么搞，都是一个村，我们会有意见的……像这边（飞虫村）以前有村部，都搬到那边（竹子村）去了。竹子那边的农家乐和民宿也比飞虫多，游客都到那边去了，在我们这里（飞虫村）停一下就走了，留不住人。”

——访谈对象14

3.5 失落感产生

“社区失落论”的倡导者主张，大规模的城市化加剧社区居民的分化，物欲横流的社会环境使得人与人之间猜忌怀疑、关系疏离、人情冷漠，导致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逐渐淡化（丁凤琴，2010）。同样，这种失落感也出现在脱贫村。

“人们之所以变得冷漠，因为缺乏凝聚力，缺乏使人们团结的力量”（Mike, 2003）。十八洞村农户的凝聚力，一是来源于族群身份的认同。十八洞村是一个典型的苗族聚居村，苗族没有文字，其民族文化通过苗歌和苗语世代相传。苗歌和苗语不仅是苗族文化的载体，而且也是苗族人民集体情感的载体。苗族人民通过唱苗歌、说苗语，强化族群的文化记忆，找到同族人民的身份认同，增强民族凝聚力。二是来源于村中守望相助的民风。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之前，农业耕种是十八洞村农户最基本的经济活动。他们在同一环境下生活，保持相同的生产方式，相似的生活逻辑，必然会发生多方面的、频繁的互动，最终形成一个以血缘与地缘为基础的“熟人社会”。

精准扶贫政策实施后，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增加，以及网络通讯技术的普及，苗歌和苗语的使用机会被大量压缩。年轻群体迎合现代生活习惯，民族文化观念变得淡薄，苗歌、苗语和苗绣这类承载集体记忆的民族文化在十八洞村的苗族农户中逐渐消亡。民族文化的消解和传统文化观念的没落使得十八洞村农户失去表达文化认同的能力，从而产生失落感。

“我们会一些简单的儿歌，平时唱给宝宝听，像我妈妈（辈份的）老人家会的（苗歌）多，平时在家里做活的时候也会唱……反正到我们这代什么都不会，绣花也不会……我们在孩子面前要说普通话，因为（孩子）学校里要考，和家里人在一起时会说一点（苗语），但是也有许多太土的话不会说了，爷爷奶奶那些老人家还是会说的。”

——访谈对象16

脱贫攻坚期间，十八洞村通过招商引资不断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市场经济，农户的生计以经商或打零工为主，务农为辅。农户逐渐从传统的家族或集体中脱离出来，越来越多地依靠市场满足其劳务需求，以支付薪酬的方式逐步取代传统的社会协作方式。农户之间由“血缘”“地缘”互助关系变成“业缘”的竞争关系，在社会交往中更加注重经济利益，社会关系变得复杂脆弱，从而产生失落感。以往小农社会中互帮互助的民风在当今的市场环境下不再被需要或被认同，这种民风反而让一些农户产生道德绑架的压力和逃离的想法。

“毕竟你在农村啊，邻居家里有点什么事，请假也请不了，所以村里有事的话就会很为难……（外）出远了，你不管人家也不会不计较了，（如果）你住的近，就不可能不去（帮忙）。 ”

——访谈对象6

“现在让人家帮忙很难了，还是以前好一些，现在让人家帮忙都是要开工资的，以前哪里有人要工资。”

——访谈对象21

“以前，村中有人盖房子，全村人都会去他家里，一次就要把房子盖成……现在的年轻人，眼中只有钱，人情谈不上了……现在（有事）都要请人了，（村里人）就算帮你，也只能帮你做个一两天，他们也要过自己的生活啦。”——访谈对象33

4 脱贫村农户的情感重构机制

4.1 农户认知是情感重构的核心力量

复杂系统理论认为系统主体是系统内部的具有自身目的与主动性的、积极的“活的”主体。这种主动性以及它与环境的作用是系统发展和进化的基本动因(陈述等, 2005)。十八洞村农户对周围环境的认知和互动正是其情感重构的主要原因。心理学主张认知是情感的基础, 情感是行为的源泉, 当三者协调一致时, 有机体才会处于积极的心理状态(王雁, 2002)。在精准扶贫前, 未经开发的十八洞村, 恶劣的自然条件无法满足农户的生存需求, 迫使农户背井离乡, 靠打工维持生计。此时, 农户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处于割裂状态, 情感上仍然依恋家乡, 但对现实环境的认知, 使他们必须外出谋生, 农户处于消极的心理状态。如果没有外界干预, 任凭这种消极的心理状态一直持续, 将会导致农户形成悲观、颓废的生活态度; 或者有些农户在外谋得好生活, 就会将家人接到身边满足团聚的愿望。这两种结果, 都不利于乡村的繁荣兴旺, 也与乡村振兴战略的要求背道而驰。

精准扶贫后, 政府部门对村子的各项改革和建设, 让农户认识到村中现有的资源条件、发展潜力、可获得收入足够支撑未来的生活, 于是选择回乡就业, 既满足团聚的情感需要, 也可以维持良好生活。此时, 农户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协调一致, 农户拥有积极的心理状态。当农户对所在村落的归属感和幸福感等积极情感强化, 其拥有的情感能量会发挥正向功能, 促使农户作出正向的反应行为。农户会努力地去维护现在所处的环境, 并尽力维持或者强化目前良好的心理状态。如精准扶贫政策实施前, 十八洞村农户逃离村落, 政策实施后, 农户组织志愿队主动投入脱贫村建设; 精准扶贫政策实施前, 十八洞村农户排斥扶贫工作, 政策实施后, 农户积极捕捉商机拓展收入渠道, 如“返乡”农户回乡开农家乐、年轻群体创业发展网红经济、留守妇女成立苗绣合作社, 盘活村落特有的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 实现从“要我脱贫”到“我要脱贫”“我要致富”的转变。农户是村内生产生活的主体, 相关政策只有尊重主体的心理需求和行为逻辑, 满足主体的切身利益, 才能行之有效。但也应该注意

到, 农户的认知水平低, 目光不够长远, 容易受到误导或者被利益蒙蔽而作出低质量的决策。如在精准扶贫政策下, 外部资源短时期内涌入村内, 村落物质环境大为改善, 农户通过改变行为方式, 促进自身与环境的不断交互, 在资源转换机制作用下将资源转换为自身所需, 物质生活条件不断改善, 但却忽视了传统文化和淳朴民风的传承, 导致承载集体记忆的民族文化逐渐消亡, 疏于沟通的乡邻关系也日益脆弱, 集体认同感降低, 产生了失落感。长此以往, 苗族文化的活态性、原真性和独特性的消减将反噬村中旅游业的发展, 集体认同感的衰退会导致村中凝聚力下降(麻三山, 2009)。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负面影响将使农户的积极情感消退, 消极情感滋生。

4.2 政府行动是情感重构的主导力量

政府通过重构村落人居环境系统, 优化产业结构, 引入先进的生产、经营和治理理念等方式重塑农户的地方情感, 是农户情感重构的主导力量。首先, 政府通过制定政策和组织编制规划保障其他主体参与扶贫治理的秩序, 如编制《十八洞村2014—2016年扶贫工作总体规划》《十八洞村传统村落保护规划》等系列文件, 以“修旧如旧”“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为理念, 保护村落传统的空间格局和古朴的建筑风貌, 全面实施“三通”“五改”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大力改善和优化其人居环境。其次, 政府通过招商引资积极探索产业扶贫新思路, 大力发展特色种养殖业、乡村旅游业、教育培训产业、矿泉水产业等, 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业态不断创新, 农户经济收入不断增加。再次, 政府通过管理培训和技能培训, 提升村委和党员管理治理能力, 培养农户特色种养殖专业技能, 启蒙农户的理财意识, 提供多样化致富及参与村内建设的渠道。最后, 政府通过举办苗舞、歌咏、苗鼓、小品等文娱活动, 丰富农户的业余生活, 满足农户对家园的依恋和现代文明生活的向往的双重情感需求。政府作为精准扶贫工作的主管部门和服务部门, 其主导地位不可动摇。但也应该注意到, 在施策过程中, 如果政府部门难以平衡村组之间的各项权益, 便会让农户间产生相对剥夺感, 不利于脱贫村和谐稳定地步入乡村振兴阶段。

4.3 企业行动是农户情感重构的辅助力量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指

出：“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通过多种方式参与扶贫开发”（中国政府网，2011）。打赢脱贫攻坚战需要动员全党全社会的力量，社会力量包括各种社会组织、民营企业和个人力量等。其中，民营企业在政府的招商引资政策下，通过开发资源、投资兴业、捐赠救助、智力帮扶等多种方式参与扶贫工作，并且利用自身优势，发挥市场经济优化配置资源的作用，提高脱贫村抵御风险的韧性和扶贫工作效率，因此企业行动是推进脱贫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如“步步高”集团与十八洞村合作，投资建设十八洞水厂，采用“资金入股+保底分红”模式发展自来水产业。作为十八洞村第一个集体经济，水厂给农户带来极大的精神鼓舞。时任十八洞村第一书记石登高感慨道：“不仅改变了

村里的经济状况，更改善了村里人的精神面貌”。衡阳市投资援建的白芨中草药种植项目签约十八洞村，企业提供技术指导，并承诺三年后保底收购，消除农户的后顾之忧。除此之外，十八洞村还与湖南国强文化有限公司建立合作关系，发展文化产业，村集体以门面租赁方式获取收益。民营企业通过多种方式入驻十八洞村，为农户提供就业机会，并通过技能培训增强农户的人力资本，给农户提供参与村中经济建设的多样化渠道，调动农户的积极性。

在上述三类行动中，农户行动属于村落系统内部力量，政府和企业行动属于系统外部力量。它们之间相互作用，共同构成脱贫村农户情感重构的动力机制（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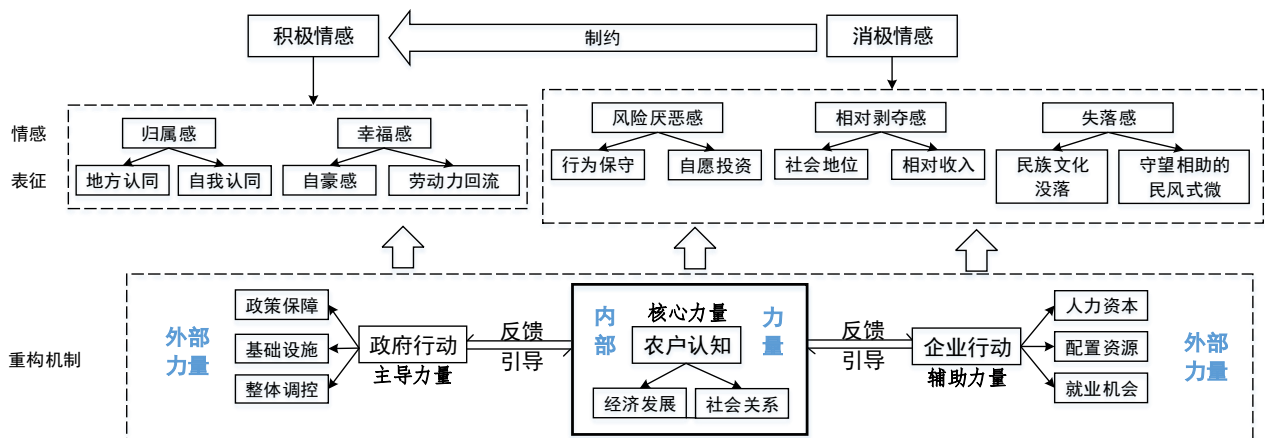


图2 农户情感重构机制示意

Fig.2 Schematic diagram of farmers' emotion reconstruction mechanism

5 结论与讨论

1) 精准扶贫政策语境下脱贫村农户情感重构主要包括归属感、幸福感、风险厌恶感、相对剥夺感和失落感5个维度。其中，归属感和幸福感属于积极情感，风险厌恶感、相对剥夺感、失落感属于消极情感。它们相互影响、相互制约。

2) 各项扶贫措施的实施使得脱贫村的物质空间、产业结构、经济收入、治理服务等得到优化或提升，引发农户的地方归属感上升，幸福感增强和风险厌恶感下降。然而，由于扶贫力度的不均衡，导致部分农户产生相对剥夺感；传统文化的消解和社会关系的重构等使部分农户产生失落感。

3) 在脱贫村农户情感重构过程中，农户认知

是核心力量，政府行动起主导作用，企业行动发挥辅助作用。政府和企业行动通过重构乡村地域系统的物质空间、经济空间和社会空间刺激乡村地域主体即农户认知转变，继而引发情感的重构。

情感可以激发主体的后续行动，消极情感能够破坏目标定向行为，而积极情感可以维持目标定向行为（Pranken, 2005）。脱贫村为保证脱贫效果，促进和谐发展，并顺利实现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应该注重采取相关措施弱化农户的消极情感、强化农户的积极情感，促进农户情感的正向再生产（刘玉珍，2019）。情感的空间性决定积极情感的产生前提是良好的生活环境，包括美丽宜居的人居环境、和谐的邻里关系。情感的社会性则为乡村治理

提供新思路,即利用榜样的积极情感同化感染农户,使个人积极情感转变为集体情感;同时通过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留住集体记忆,是消除失落感,增加归属感的重要途径。情感的层次性和时间性意味着农户的积极情感经过时间磨炼后,可以固化为高级情感,从而阻止消极情感的代际传递。这呼吁社会各界力量通过发展农村教育,提升农户的认知,增强农户抵御风险的自信心,消除风险厌恶感。政府行动是引导农户和其他社会力量积极反馈的主导力量,因此政府部门一旦发现农户的消极情感,应该及时疏导,并调整自身行动。同时,也需要注意到,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衔接阶段,农户的情感需求也出现新层次的变化,如对娱乐生活的需求上升。脱贫村应该组织多种体育类、益智类和文娱类活动,丰富农户的业余生活,营造活力四射的民风。只有通过提高农户主人翁的身份认同感,调动其参与村内建设和治理决策的积极性,充分发挥村落系统内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才有可能促进脱贫村向乡村振兴有序跃升。本文通过“地方-情感-行为”分析模式,有助于理解宏观政策语境下乡村地域系统重构中农户情感、行为与社会物质环境的互动过程以及农户的主体意义,为促进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提供有益的参考。

然而,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对脱贫村农户情感重构的研究,仅基于十八洞村的个案研究发现,其结论是否普遍适用于不同人地关系系统中的脱贫村农户情感重构的解释,还需要通过后续相关案例研究予以佐证。此外,本研究在构建脱贫村农户情感重构维度的过程中,取“留守”和“返乡”两类农户的共同点进行分析,尚未对两类农户情感重构各自的特点及其差异进行深入的讨论;同时,对第三类农户即外城农户的情感重构也尚未涉及,这需要在后续研究中进行补充与深化。

致谢:感谢匿名审稿专家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和建议!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曹艳春,侯万锋.2018.新时代精神扶贫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甘肃社会科学,(6):177-182.[Cao Yanchun and Hou Wanfeng. 2018. Realistic Dilemma of Spiritual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Path Selection. *Gansu Social Sciences*, (6): 177-182.]
- 陈淇淇.2019.社会空间变迁视域下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群体的社会适应研究.贵阳:贵州大学.[Chen Qiqi. 2019. Social

Adaptation of the Displaced Groups in the Context of Social Space Change. Guiyang: Guizhou University.]

- 陈述,盛毅华.2005.现代系统科学学.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Chen Shu and Sheng Yihua. 2005. *Modern System Science*. Shanghai: Shanghai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Literature Press.]
- 程军.2019.精准扶贫: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情感逻辑.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36(3):116-124.[Cheng Jun. 2019.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Emotional Logic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National Governance. *Journal of Shenzhen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36(3): 116-124.]
- 程肇基.2016.精神扶贫:一个亟待关注的精准扶贫新领域.江西社会科学,36(11):210-216.[Cheng Zhaoji. 2016. Spiritual Poverty Alleviation: A New Field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that Needs Urgent Attention. *Jiangxi Social Sciences*, 36(11): 210-216.]
- 邓遂.2003.现代城市社区情感障碍分析.城市问题,(4):47-49,36.[Deng Sui. 2003. On the Community Emotional-Segregation. *Urban Problems*, (4): 47-49, 36.]
- 丁波.2020.新主体陌生人社区: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空间重构.广西民族研究,(1):56-62.[Ding Bo. 2020. New Subject Stranger Communities: Spatial Reconstruction of Relocated Poor Populations from Inhospitable Areas Communities in Ethnic Areas. *Guangxi Ethnic Studies*, (1): 56-62.]
- 丁凤琴.2010.关于社区情感的理论发展与实证研究.城市问题,(7):23-27.[Ding Fengqin. 2010.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Feelings. *Urban Problems*, (7): 23-27.]
- 杜宗斌,苏勤,姜辽.2013.乡村旅游地居民社区归属感模型构建及应用——以浙江安吉为例.旅游学刊,28(6):65-74.[Du Zongbin, Su Qin and Jiang Liao. 2013. A Structural Model of Residents' Sense of Community in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s and Its Application: A Case Study of Anji County in Zhejiang Province. *Tourism Tribune*, 28(6): 65-74.]
- 房彬,房婷.2021.精神脱贫:内涵阐释与路径探索.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1(2):78-83.[Fang Bin and Fang Ting. 2021. Spiritual Poverty Alleviation: Connotation Interpretation and Path Exploration. *Journal of 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s)*, 21(2): 78-83.]
- 古丽扎克伯,辛自强,李丹.2011.地方依恋研究进展:概念、理论与方法.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5):86-93.[Gulizakbo, Xin Ziqiang and Li Dan. 2011. Research Progress of Place Attachment: Concept, Theory and Method. *Journal of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5): 86-93.]
- 蒋莉莉.2012.农户行为理论的基本总结.青春岁月,(12):385-386.[Jiang Lili. 2012. Basic Summary of Farmer Behavior Theory. *Youth Years*, (12): 385-386.]
- Kiss E. 2000. Rural Restructuring in Hungary in the Period of Socio-

- Economic Transition. *GeoJournal*, 51(3): 221-233.
- 杭承政, 胡鞍钢. 2017. “精神贫困”现象的实质是个体失灵——来自行为科学的视角.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4): 97-103, 147. [Hang Chengzheng and Hu An'gang. 2017. The Essence of "Mental Poverty" Phenomenon Is Individual Failure—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ehavioral Science. *Journal of Chinese Academy of Governance*, (4): 97-103, 147.]
- 李平, 宋宛锋, 刘晓石, 周晓贞. 2013. 旅游地社区居民“相对剥夺感”的心理疏导对策研究——以丽江束河古镇为例. 市场论坛, (9): 87-89. [Li Ping, Song Wanfeng, Liu Xiaoshi and Zhou Xiaozhen. 2013. Study on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Countermeasures for "Relative Deprivation" of Community Residents in Tourist Destination: A Case Study of Shuhe Ancient Town in Lijiang. *Market Forum*, (9): 87-89.]
- 林亦平, 魏艾. 2018. “返乡”人口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补位”探究. 农业经济问题, (8): 91-97. [Lin Yiping and Wei Ai. 2018. Study on the Supplement of "City Return" Population Under the Vis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 (8): 91-97.]
- 林元城, 杨忍, 赖秋萍, 王敏. 2020. 地方感的塑造与乡村治理: 潮汕宗祠案例. 热带地理, 40 (4): 732-743. [Lin Yuancheng, Yang Ren, Lai Qiuping and Wang Min. 2020. Construction of Sense of Place and Rural Governance: A Case Study of Chaoshan Ancestral Hall. *Tropical Geography*, 40(4): 732-743.]
- 刘彦随, 周扬, 刘继来. 2016. 中国农村贫困化地域分异特征及其精准扶贫策略. 中国科学院院刊, 31 (3): 269-278. [Liu Yansui, Zhou Yang and Liu Jilai. 2016. Regional Differenti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Poverty and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Strategy in China. *Bulleti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31 (3): 269-278.]
- 刘逸, 保继刚, 朱毅玲. 2017. 基于大数据的旅游目的地情感评价方法探究. 地理研究, 36 (6): 1091-1105. [Liu Yi, Bao Jigang and Zhu Yiling. 2017. Exploring Emotion Methods of Tourism Destination Evaluation: A Big-Data Approach. *Geographical Research*, 36(6): 1091-1105.]
- 刘玉珍. 2019. 农村精准扶贫实践中的情感逻辑及其治理路径. 云南社会科学, (5): 29-36, 186. [Liu Yuzhen. 2019. Emotional Logic and Governance Path in the Practice of Rural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Yunnan Social Science Press*, (5): 29-36, 186.]
- 罗婷. 2020. 斯科特农民生存伦理思想研究.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 [Luo Ting. 2020. Research on Scott's Farmer Survival Ethics. Nanjing: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 吕龙, 陈晓艳. 2021. 乡村文化记忆的场域认知、依恋与传承关系——以苏州金庭镇为例. 热带地理, 41 (3): 485-494. [Lyu Long and Chen Xiaoyan. 2021.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Field Cognition, Place Attachment, and Inheritance Path in Rural Cultural Memo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idents: A Case Study of Jinting Town, Suzhou. *Tropical Geography*, 41(3): 485-494.]
- MacIver R M. 1931. *Society: Its Structure and Changes*. New York: Long & R R Smith.
- Mickelson K D and William D L. 2008. Perceived Stigma of Poverty and Depression: Examination of Interpersonal and Intrapersonal Mediators. *Journal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27(9): 903-930.
- Mike Krone. 2003. *Cultural Geography*.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 Moeinaddini M, Assdi-Shekari Z, Aghaabbasi M, Saadi I, Shah M Z and Cools M. 2020. Proposing a New Score to Measure Personal Happiness by Identifying the Contributing Factors. *Measurement*, 151: 1-15.
- 麻三山. 2009. 族群、情感与和谐社会构建. 宜宾学院学报, 9 (3): 48-51. [Ma Sanshan. 2019. Ethnic Group, Mo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Harmonious Society. *Journal of Yibin University*, 9(3): 48-51.]
- Nancy Ettlinger. 2004. Toward a Critical Theory of Untidy Geographies: The Spatiality of Emotions in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 *Feminist Economics*, 10(3): 21-54.
- Pranken R F. 2005. 人类动机: 当代心理学经典教材译丛. 郭本禹, 译.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Pranken R F. 2005. *Human Motivation*. Guo Benyu. Trans. Xi'an: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 邵培仁, 林群. 2011. 时间、空间、社会化: 传播情感地理学研究的三个维度. 中国传媒报告, 10 (1): 17-29. [Shao Peiren and Lin Qun. 2011. Time, Space and Socialization: Three Dimensions of Communication Emotion Geography. *China Media Report*, 10 (1): 17-29.]
- 孙小龙, 邵捷, 林璧属, 李磊. 2019. 旅游者在场情感体验建构: 理论模型与实证检验. 热带地理, 39 (3): 430-439. [Sun Xiaolong, Gao Jie, Lin Bishu and Li Lei. 2019. Construction of Tourists' Emotional Experience in the On-Site Stage: Theoretical Model and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Tropical Geography*, 39(3): 430-439.]
- 陶伟, 蔡少燕, 余晓晨. 2019. 流动性视角下流动家庭的空间实践和情感重构. 地理学报, 74 (6): 1252-1266. [Tao Wei, Cai Shaoyan and Yu Xiaochen. 2019. The Emotional Reconstruction and Spatial Practices of Mobilizing Family: A Perspective from Mobility.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74(6): 1252-1266.]
- William M R. 2001. *The Navigation of Feeling: A Framework for the History of Emo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oods M. 2011. *Rural*.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汪三贵, 冯紫曦. 2020.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逻辑关系. 贵州社会科学, (1): 4-6. [Wang Sangui and Feng Zixi. 2020. Logic in Effective Connec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Guizhou Social Sciences*, (1): 4-6.]
- 王孟永. 2018. 社区认同、环境情感结构与城市形态发生学机制研究——基于上海曹杨新村的测量与评价. 城市规划, 42 (12): 43-54. [Wang Mengyong. 2018. Research on Community Identity, Emotional Structure of the Environment, and Urban Morphogenetic Mechanism: Based on the Measurement and

- Evaluation of Caoyang Xincun in Shanghai. *City Planning Review*, 42(12): 43-54.]
- 王雁. 2002. 普通心理学.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Wang Yan. 2002. *General Psychology*. Beijing: People's Education Press.]
- 吴丽敏. 2020. 古镇旅游地居民“情感-行为”分异与情感空间建构.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Wu Limin. 2020. *The "Emotion Behavior" Differentiation and Emotion Space Construction of Residents in Ancient Town Tourism Area*. Beijing: Economic Management Press.]
- 吴良镛. 2001. 人居环境科学导论.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Wu Liangyong. 2001. *Introduction to Human Settlements*. Beijing: China Construction Industry Press.]
- 向德平, 向凯. 2020. 情感治理: 驻村帮扶如何连接国家与社会. 南开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6): 84-93. [Xiang Deping and Xiang Kai. 2020. Emotion Governance: How Do Assigned Cadres in Villages Connect the State and Society. *Nankai Journal (Philosophy, Literature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6): 84-93.]
- 行腾辉, 王晓峰. 2021. 疫情期间武汉樱花的情感效应研究. 热带地理, 41 (1): 25-35. [Xing Tenghui and Wang Xiaofeng. 2021. Emotional Effect of Cherry Blossoms in Wuhan During the COVID-19 Epidemic. *Tropical Geography*, 41(1): 25-35.]
- 杨宝泉, 贾晓辉. 2008. 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进行情感关怀和心理救助的探索与实践. 中国高教研究, (2): 67-68. [Yang Baoquan and Jia Xiaohui. 2008.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Emotional Care and Psychological Assistance for Students with Financial Difficulties. *China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2): 67-68.]
- 赵明. 2020. 农户视角的城镇化动力与模式研究: 基于传统农区周口市的调查.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Zhao Ming. 2020. *Research on the Driving Force and Mode of Urban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rmers: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Zhoukou City, A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Area*. Beijing: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 赵昭, 张朝枝. 2018. 历史背景认知对殖民遗产旅游情感体验的影响——以广州沙面岛为例. 热带地理, 38 (5): 707-716. [Zhao Zhao and Zhang Chaozhi. 2018. Influence of Background Knowledge on Colonial Heritage Tourist Emotional Experience: A Case Study of Shameen, Guangzhou. *Tropical Geography*, 38(5): 707-716.]
-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2019. 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Research Institute of CPC Central Committee History and Documents. 2019. *Excerpt from Xi Jinping's Discussion on the Work of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Beijing: Central Party Literature Press.]
- 中国政府网. 2011.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 (2011-12-15) [2015-10-21].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1/content_2020905.htm. [Chinese Government Website. 2011. Outline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Rural China (2001-2010). (2011-12-15) [2015-10-21].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1/content_2020905.htm.]
- 朱竑, 高权. 2015. 西方地理学“情感转向”与情感地理学研究述评. 地理研究, 34 (7): 1394-1406. [Zhu Hong and Gao Quan. 2015. Reviews on "Emotional Turn" and Emotional Geographies in Recent Western Geography. *Geographical Research*, 34 (7): 1394-1406.]
- 邹雪瓶, 谢波, 李志刚, 陈宏胜, 刘晔. 2020. 中国城市流动人口情感及其社区生活感知研究——以广州市为例. 城市规划, 44 (6): 31-38. [Zou Xueping, Xie Bo, Li Zhigang, Chen Hongsheng and Liu Ye. 2020. A Study on Urban Migrants' Emotion and Perceived Neighborhood Life in China: Taking Guangzhou as an Example. *Urban Planning*, 44(6): 31-38.]
- 左昭, 付少平. 2018. 精准扶贫背景下移民生计空间再造与优化——基于陕西S县的实地调查. 农村经济与科技, 29 (9): 130-131. [Zuo Zhao and Fu Shaoping. 2018. Reconstruction and Optimization of Livelihood Planning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Based on the Field Survey of S County of Shaanxi Province. *Rural Economy and Science-Technology*, 29(9): 130-131.]

作者贡献声明:

陈驰蕊: 搭建论文框架, 实地调研, 资料整理与分析, 论文撰写与修订;

何 峰: 提出研究选题和研究思路, 指导研究过程, 提出修改意见, 提升论文质量;

汤放华: 提出研究思路和修改意见。

Emotional Reconstruction of Farmers in Poverty-Alleviated Villa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otional Geography: A Case Study of Shibadong Village in Hunan Province

Chen Chirui^{1,2}, He Feng^{1,2} and Tang Fanghua^{1,3,4}

(1. College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China; 2. Hunan Key Laboratory of Geospatial Big Data Mining and Application, Changsha 410082, China; 3. Hunan City University, Yiyang 413000, China; 4. Key Laboratory of Key Technologies of Digital Urban-Rural Spatial Planning of Hunan Province, Yiyang 413000, China)

Abstract: The aim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to improve the prosperity of farmers. However, farmers are not purely "economics-driven people." In fact, their behavioral logic is driven by internal emotions, which can affect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At the same time, changes in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can alter a farmer's emotions toward the place. Therefore, research on the emotional reconstruction of farmers in villages where poverty has been alleviated is not only conducive to guiding the direction of construction and governance of such villages and maintaining their harmonious and stable development but also helpful for retaining "returning" farmers. These farmers make up for the absence of the "main body"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village, all of which is significant for the smooth realization of effective connections between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For this article, Shibadong Village in Huayuan County, Hunan Province was chosen as the case study, with the "left behind" farmers and "returning" farmers in the village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otional geography, we used in-depth interviews and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methods to explore the emotional reconstruction of the farmers and the related mechanism involve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The research showed that 1) the emotional reconstruction of farmers in poverty-alleviated villages mainly includes the reconstruction of five perceptions sense of belonging, sense of happiness, sense of risk aversion, sense of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sense of loss. 2)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has optimized or improved the material space, industrial structure, economic income, and governance services of poverty-alleviated villages, resulting in increases in the farmers' senses of local belonging and happiness and a decrease in their sense of risk aversion. However, an imbalance in poverty alleviation efforts leads to an enhancement of their sense of relative deprivation. The dissolu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s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social relationships result in the farmers feeling lost. These five senses of emotions affect and restrict one another. 3) In the process of emotional reconstruction of farmers in poverty-alleviated villages, the cognition of the individuals is the core force of the process. However, farmers find it difficult to make long-term and wise decisions because of their low cognitive level, which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positive development of emotions. As the leading force driving the emotional reconstruction of farmers, the government—through various poverty alleviation measures—coordinates the order of other individuals participating in poverty alleviation governance, optimizes the rural regional system in the poverty relief village, and improves the farmers' cognition to reshape their local emotions. Enterprises play an auxiliary role in this process, participating in poverty alleviation in various ways. In addition, they facilitate the market economy in optimizing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and improving both the efficiency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the resilience of poverty-alleviated villages to resist risks. To consolidate the achievemen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ealize rural revitalization, poverty-alleviated villages should take relevant measures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motional space, time, sociality, and hierarchy to cultivate positive emotions, and reduce negative ones, in the farmers. Use of the "place-emotion-behavior" analysis model is helpful for elucidating the interactive processes between the emotions, behaviors, and social material environments of farmers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ose individuals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rural regional system in the context of macro policies.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useful reference for promoting the effective connection between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words: emotional geography; emotional reconstruction; farmer; poverty-alleviated villages;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Shibadong Village